

法兰西学院院士勒内·格鲁塞为您解读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兴盛密码

THE RISE AND SPLENDOUR
OF THE CHINESE EMPIRE

伟大的历史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兴盛与辉煌

[法] 勒内·格鲁塞◎著 秦传安◎译



THE RISE AND SPLENDOUR
OF THE CHINESE EMPIRE

伟大的历史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兴盛与辉煌

[法] 勒内·格鲁塞◎著 秦传安◎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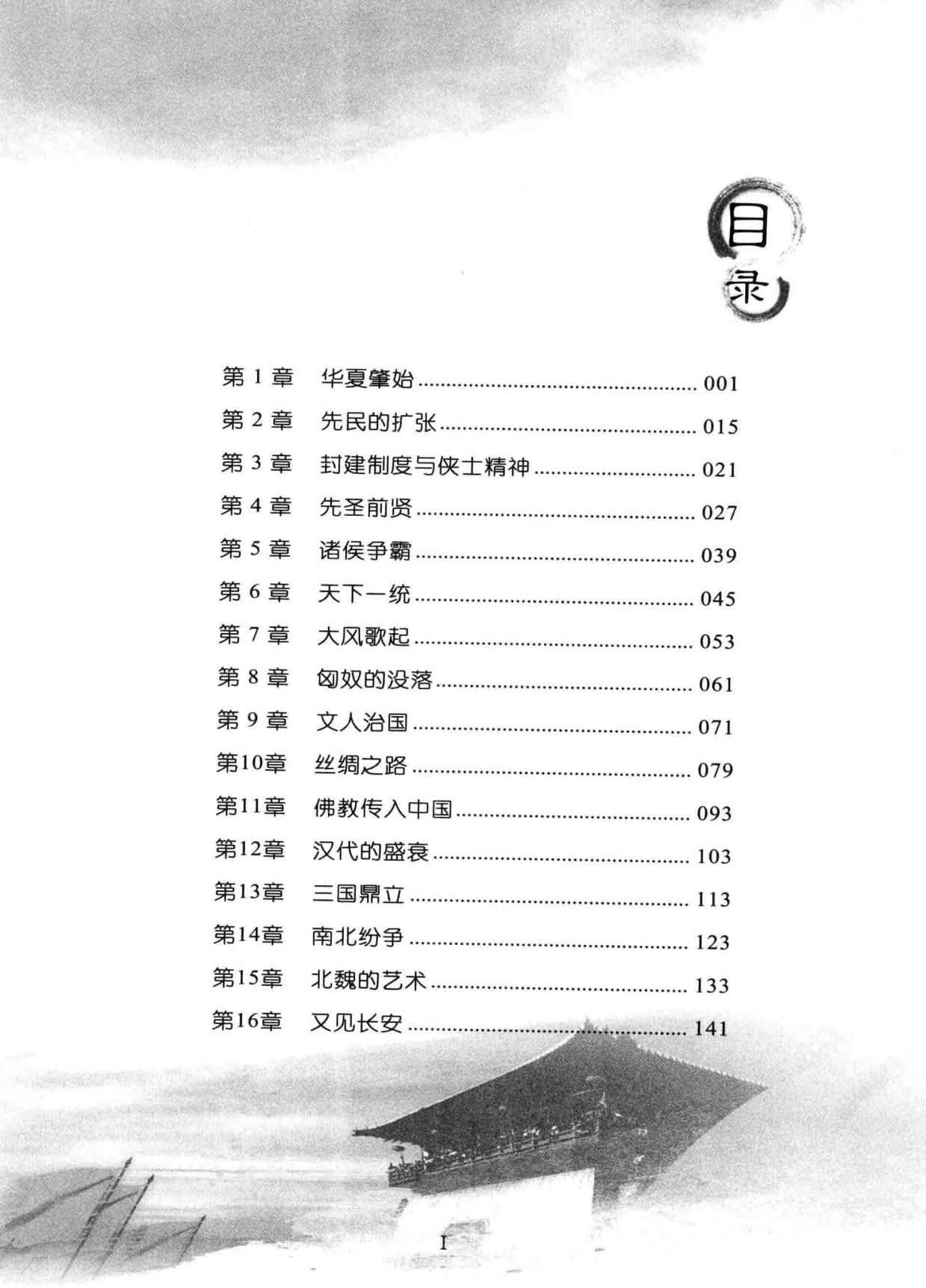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伟大的历史：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兴盛与辉煌 / (法) 格鲁塞著；
秦传安译.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4
ISBN 978-7-214-15355-5

I. ①伟… II. ①格… ②秦 III. ①中国历史 IV.
① K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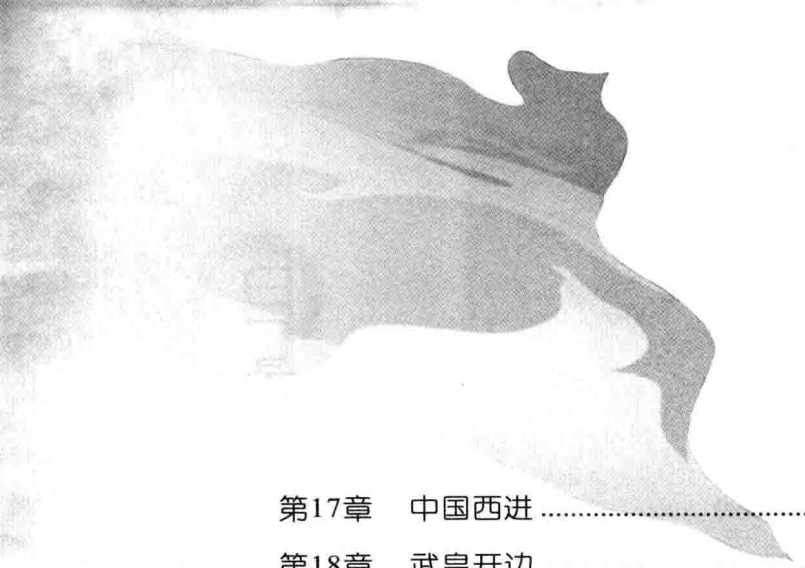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82039 号

书 名 伟大的历史——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兴盛与辉煌
著 者 【法】格鲁塞
译 者 秦传安
责任编辑 朱 超
装帧设计 异 一
版式设计 张文艺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http://jsrmcbs.tmall.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8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2
字 数 198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978-7-214-15355-5
定 价 38.00 元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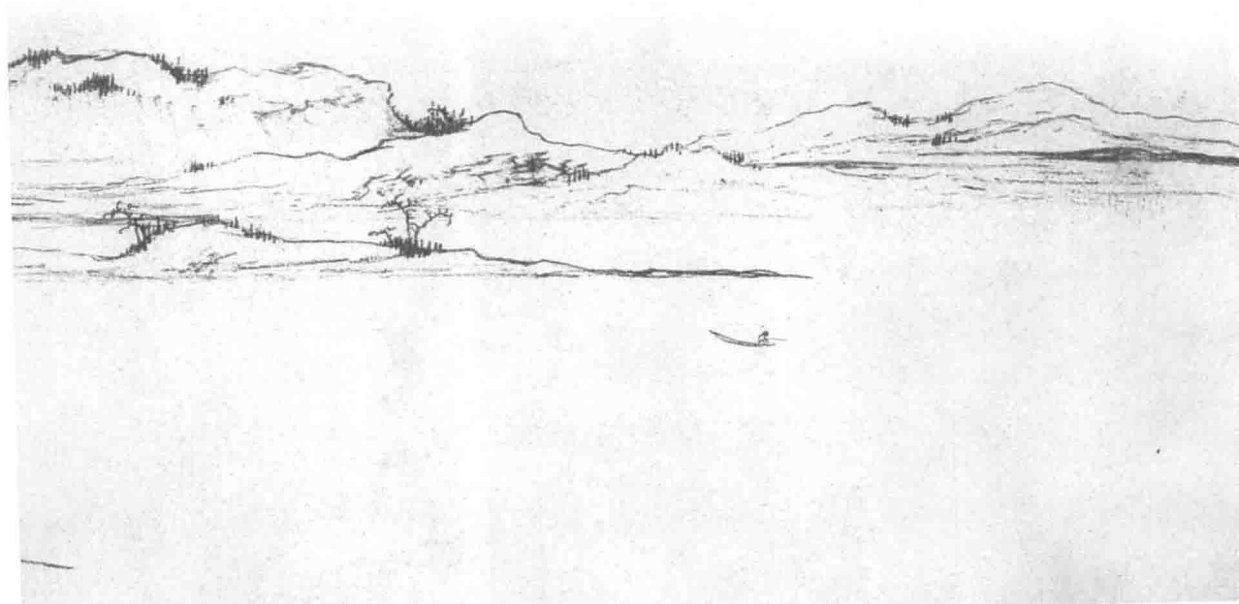
第1章	华夏肇始	001
第2章	先民的扩张	015
第3章	封建制度与侠士精神	021
第4章	先圣前贤	027
第5章	诸侯争霸	039
第6章	天下一统	045
第7章	大风歌起	053
第8章	匈奴的没落	061
第9章	文人治国	071
第10章	丝绸之路	079
第11章	佛教传入中国	093
第12章	汉代的盛衰	103
第13章	三国鼎立	113
第14章	南北纷争	123
第15章	北魏的艺术	133
第16章	又见长安	141



第17章	中国西进	147
第18章	武皇开边	169
第19章	大时代	179
第20章	社会危机	199
第21章	宋代与改革的难题	207
第22章	一路南迁	221
第23章	生活的优雅	229
第24章	中国思想的结晶	245
第25章	世界征服者	259
第26章	一张大版图	269
第27章	欧洲人的寻梦	287
第28章	民族的救赎	299
第29章	1644年的大戏	315
第30章	最后的王朝	323
译后记		346

第1章

华夏肇始



亚洲文明是众多美索不达米亚之类的大冲积平原的产物，这些地方，土壤的天然肥沃激发了人的农业才能。这就是巴比伦在西亚的情形，也是中国的“中原”在东亚的情形。

这片大平原，从北方的北京到南方的淮河，从西部洛阳的通衢大道到东部山东的崇山峻岭，覆盖范围超过12万5千平方英里，面积比英格兰和爱尔兰还要大。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埃及是“尼罗河的馈赠”，同样，中原也是黄河及其支流的馈赠。“在相对晚近的时期里——我们是在地质学家所赋予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说法——这块平原是一片海湾，大海的波涛冲刷着山西的绝壁悬崖，而今天的山东半岛，当时还是一座岛屿。”从远古时期起，黄河就从更远的西部黄土高原携带着巨大的泥土冲积层滚滚而下，把它们堆积到这一区域，因此创造了一片非常肥沃的冲积土。作为这一泥土沉积物不断积累的结果，大海被阻挡住了，海岸线不断向东延伸；这个过程今天依然在继续。就这样，年复一年，泥浆抬升了黄河的河床，两岸的居民不得不相应地筑高他们的堤坝，结果，这条大河流到下游的时候已经远远高出平原之上；这是一种荒谬的情境，充满了极度的危险。

再向西，在中原的那边，绵延着层层叠叠的黄土梯田，覆盖面积超过26万平方公里，那条营养丰富的大河就是从这里发源。

这一丘陵起伏的地区，整个都被浩瀚无垠的黄土层所覆盖，它类似于阿尔萨斯黄土，是在过去数千年里被大风所堆积起来的细腻的黏土、沙粒和石灰岩的尘粉，形成了大块的整体，岁月的侵蚀把它们切割成层层梯田。总的来看，这是一块像中原一样肥沃的土地（那时候这里并不缺雨）。这里是黍稷和小麦的王国^[1]。最后，还有一些广袤的区域，从北京到开封，再从开封到南京的门户，西北梯田的黄土与中原的冲积泥层在这里悄无声息地融合，组成了整个地区最肥沃的部分。在这一区域，黍稷耕作与水稻耕作^[2]结合了起来，前者适合于黄土梯田，后者则更适合于淮河流域和长江^[3]流域。

中华文明就是从这一地区兴起，与农业的发展携手并进，或者毋宁说，是与黍稷耕作以及后来的水稻耕作携手并进。史前时期不为人知的那几百年时间，被用来焚烧并清理覆盖着西北黄土高原的灌木丛林，被用来排干浸润着东北中央平原的沼泽湿地。《诗经》中的远古歌谣颂扬了这项劳作：“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还有：“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为？我艺黍稷。”^[4]在那些因为指导这种集体劳动而受到颂扬的神性英雄中，有一位是神农，他教会人们刀耕火种、使用锄头；另一位是后稷——“黍稷之王”。还有一项同样重要的劳动，要归功于传说中夏朝的创立者大禹。他通过挖沟排水的工作，从水中开拓土地，“让江河退回大海”，并增加了沟渠与河道的数量。

正是汉人的祖先们所过的这种农业和定居的生活，把他们与那些一直过着游牧打猎生活的部落区别开来，这些游牧部落，要么生活在陕西和山西北部的大草原上，要么生活在淮河与长江流域的沼泽森林里——他们大概属于同一种族血统。没有理由认为存在种族的差异，更无法想象他们是原始中国人种的移民——有人说他们来自中亚。而且，这些“野蛮”部落，环绕着远古中原的狭小领地，他们注定终有一天也要采用汉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

式。从古风时期^[5]的末叶开始，他们逐渐放弃了自己的游牧生活，开始从事农业（在长江下游的游牧部落中，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的）。在东京湾^[6]也是一样，如果说安南人与他们的芒族同胞有什么不同的话，那是因为他们成了海滨地区稻田的耕种者，而生活在内陆森林中的芒族人却没有尝试去学习关于农业的任何东西。

就同样的地区而言，古代中国农民的社会生活，跟今日的乡村生活并无大的不同。在大平原上，他们住在泥屋里（砖要到后来才得以使用），这些泥屋抵抗不了季风雨和侵蚀所造成的毁坏；而在黄土高原上，他们则居住在从峭壁上挖出的窑洞里，田地悬于农舍之上，窑洞的通风口有时候古怪地通到耕地的中间。蚕的饲养看来也有着非常古老的起源。如果我们可以相信《禹贡》（约公元前5世纪）中提到的经济地图的话，山东及毗邻地区就很可能一直是“桑土”^[7]。除此之外，在传说中的“三皇”当中，排名第二的黄帝曾亲自教汉人养蚕，用纺织品取代他们用稻草或野兽毛皮所制成的“粗”衣。而中原农民自古以来就从灌木丛和沼泽地里开垦土地，为的是确保他们的征服地能采用一套精耕制度，这套制度在他们今天的后代中依然有效。有人写道：“中国人的农业只不过是更大规模的园艺而已。”我们可以补上一句：在中国农业的发祥地，无论是在黄土高原，还是在中原冲积地，都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林地，汉人对森林有一种憎恶感，不管是在哪里发现的。在成了这片土地的主人之后，汉人便系统地开山伐树，远远超出他们对燃料的直接需求，同时也懒得去操心如何利用那些山丘，任由它们光秃秃地躺在那里。因为有西北梯田和东北辽阔低地的养育，他们根本不愿意在高地上定居。平原上的黄土就这样世代塑造着汉人。

没有比中国农民的生活更辛苦劳累的了。尽管他们有着顽固倔犟、不屈不挠的耐性，尽管有黄土高原和中原的天然肥沃，但

他们始终听由自然环境的摆布。在干旱时节，黄土地面临饥荒的威胁，而在中原，则有黄河泛滥的危险。汉人对他们所说的“河神”怀有一种迷信色彩的畏惧，这种畏惧，佐证了远古时期的河畔居民因这位无法驾驭的邻居而感受到的恐怖。为了让河神息怒，他们总是定期向他献上童男童女作为祭品。这些大片大片的低洼地，因为缺乏造林而无力抵御洪水和干旱，这里的农民，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农民都更加勉强地依赖于土地。他们日常生活的秩序受到节令的控制。比其他任何农业地区都更加明显，这里的乡村生活被清楚地分割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从春至秋在地里劳作，接下来就是在室内过冬。春分时节，冬天的几个月里一直躺在地里的“禁牌”被竖了起来，一个头等重要的仪式——神田的首耕，由国王亲自主持，给土地“驱神”。春分不仅预兆着土地的丰饶，而且预示着种族的繁盛。在“燕燕于归”之日，人们开始举行婚礼，这在冬天是被禁止的。在乡村，当“初雷乍响”的时候，年轻的农夫和乡村少女们便聚集到一起，唱着情歌，在田野里结合：

溱与洧，方涣涣兮。

士与女，方秉简兮。

女曰：“观乎？”士曰：“既且。”

“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

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8]

秋分时节，在举行收获庆典之后，对于村民来说，闭门不出的冬天便开始了，这期间，女人们把她们的时间都用在了纺织上。不难看出，农民的生活范式严格遵循季节的循环。汉人最初的宇宙观，尤其是把事物分为两个一般类别的原始“分类法”，很可能就来源于此，这种分类法直至现代依然在支配着所有的中国

哲学体系，无一例外。早期的农民生活被严格地划分为两个时期，一是闭门不出的冬季，此时女性的工作很突出(这是纺织者的季节)，另一个是农业劳作时期，主要由男人打理。按照类似的分类方法，万物被分为两种法则或形态：阴和阳，阴对应阴影、寒冷、收缩、潮湿和女性，阳对应热、膨胀和男性。这两种法则，就像它们所效仿的季节阶段一样，是互相对立的，同时又互相更改、互相引发、互相转换。它们之间的互相依存，或者统辖它们的交替与转换的秩序，就是宇宙的秩序，也是社会的秩序，或者照中国人的说法，就是“道”，这是构成后来中国一切哲学学说的一个中心概念。

中国人的原始宗教，其主要目标就是确保季节的循环与农业生活的周而复始相和谐，或者像后来所说的：天人合一。天上的秩序，由居住在大熊座的“皇天”(也称“上帝”^[9])所控制。同样，人间的秩序则由国王来保证，为了这个目的，国王被授以“天命”，这让他成为“天子”。国王的职责就是为管理农事而制定历法，用必须的献祭以及与皇天相协调的仪式活动举行季节仪式。在大祭司这个角色上，国王的首要职责就是主持新年大典，通过祭献一头红牛作为燔祭向皇天祈春。接下来就是耕神田，这是农事开始的信号。在夏天的第二个月，国王要举行另外一场献祭，伴随着祈雨，如果不成功的话，那么就要处死所有的神汉和巫婆，他们因为自己的咒语被证明毫无效果而被活活烧死。最后，在冬天快要到来的时候，国王主持弃田仪式，然后带着祭品返回冬天的住处，这一次，牺牲品是一头黑牛。这次祭祀是献给“太阳神”的，接下来的一次祭祀就是献给祖先的了。最重要的一次庆典——收获庆典——圆满结束了——一个周期，全国的百姓都要参加这次庆典，饮酒狂欢，普天同庆。在每个季节，国王都要穿戴合乎季节“方位”的服饰：冬天是黑色，春天是绿色，夏天是红色，秋天是白色；这些就是他在大祭司的职位上行使职能所穿着

的僧袍。在他行使五花八门的职责时，协助他的有整个卦师和法师“团队”——这些人在早期中国哲学的苦心经营中所扮演的角色稍后我们会加以分析。

除了这种“季节循环”之外，还有一种“祖先循环”，这对今天的所有中国百姓来说是很平常的事，但在远古时期却只局限于贵族阶级。实际上，只有那些有理由被祖先灵魂附体的贵族，才是唯一的拥有一颗能够生存下来的灵魂的阶层。事实上，他们拥有两颗灵魂，一颗是纯粹的动物呼吸，注定要变成一种鬼，围绕着尸体盘旋；另一颗则是精神上的灵魂，死后以神怪的形式升天，但只有当其实体被子孙们的祭品所供养时才能生存。这种“祖先崇拜”，本质上与日常或季节性的供奉有关，这些供奉使得死人（被他的牌位所代表）能够参与到家庭生活中来。就它的起源来说（即“地神”崇拜，在原始时期被一棵树或一块粗糙的石头所代表），同样也与这种领主宗教有关。这个神（最早的地域性的神）凶狠而残暴。马伯乐^[10]说：“他喜爱祭献给他的鲜血和祭品，献祭的时候首先要用牺牲者的鲜血涂抹他的石碑。这个牺牲者通常是一头牛，不过，要是用人牲也不会让他不快。”

在人类历史上这些鸿蒙初始的时期，我们发现了一个农民社会，他们生活在中原与黄土冲积层的交汇处，在忙着清理这块远古的中国领土上的矮树丛，这是一个有着贵族阶级和君主政体的社会。那些战争领袖的存在，证明了中原农民被迫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他们时刻要警觉地提防着周围的半游牧部落。

由这个农民社会的土地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很快就产生了一个高居于社会顶端的奢侈阶层。尽管对于第一代王朝——夏朝——的政治历史我们实际上一无所知，但关于他们在这个遥远时期里所使用的器具，考古学最近给了我们一些蛛丝马迹，在最近7年里，关于第二个王朝——商朝（前1558？—前1050？），考古学为我们提供了一批意想不到的发现。

鉴定年代来自夏朝时期的最早考古发现，出土了一件粗糙的装饰陶器，饰有所谓的“篦纹”图案。这种装饰风格，在欧洲的俄罗斯被普遍使用，在公元前2000年至1500年之间的西伯利亚尤为著名，它的发现或许表明，这两个国家在那时候就已经存在某些联系了^[11]。接着是绘制器皿的发掘，近年在河南省的仰韶和秦王寨两个村子发现了一些砖红色的陶瓷器皿，绘有一种生气饱满、笔法灵动的装饰图案，包括几组意想不到的条纹、三角、斑点、交叉线和带有睫毛的眼睛。仰韶陶器出现在大约公元前1700年，这个日期与夏朝的第二阶段是一致的。

半山陶器(这是以甘肃省内自1921年起开始发掘的一个地点命名的)的鉴定年代是公元前1500年至1400年之间，或者依据某种观点是在公元前1400年至1300年之间，这个年代与商朝的第一个时期相吻合。这些器皿是真正的艺术品，绘有红黑两色螺旋纹的华丽装饰，其装饰品质堪与爱琴海的艺术品相媲美。而且，这种可比性不仅仅是风格上的，因为类似的主题在乌克兰和罗马尼亚的史前绘制陶器中也发现过，这让人不由得猜测：它们可能是通过俄罗斯草原的通路从爱琴海传到中国西北的。但毋庸置疑，这种外来的装饰风格不可能在中国的土壤中持久扎根。在半山，除了这些“爱琴海”螺旋纹装饰之外，我们还得到了很多更简单的装饰形态(棋盘图案)的证据，这些明显是从编织物上模仿来的。这种装饰形态(本土形态)是在下一个时期(约公元前14世纪)所能发现的唯一形态(螺旋纹被抛弃了)，它们是从甘肃省的马厂遗址中出土的^[12]。我们在那里看到了隔行编织物图案向绘制陶器的转移，在下一个时期里，我们将看到这些图案进入了最早的青铜器装饰。

这里我们触及到了青铜器在中国出现的秘密。据考古学家门京^[13]说，青铜器在大约公元前1500年被引入西伯利亚。然而，在中国(特别是在安阳)发现的几件非常早的青铜箭头却显示出了

西伯利亚的起源。此外，几件早期商代青铜器还透露出了对木制品的拙朴模仿的痕迹，青铜器制作者忠实地复制他的模型，甚至模仿了槽口和刀痕。突然遭遇到西伯利亚金属制作技术的汉人，仿佛一夜之间就拿起了他们远古的陶制和木制礼器，并把它们转变为青铜器。

1934—1935年间在安阳(位于今河南省的最北端)所做的考古发现，把各种各样的难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在这个公元前12世纪处于鼎盛时期的商朝古都，我们发现自己突如其来地面对着一个已经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尽管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任何东西能够揭示这一文明的发端。有一处发掘现场，占地约6公顷，完全被一幢建筑的基础所占据，这幢建筑规模宏大，被认为是一座皇宫。陵墓显示了用人和动物做牺牲的殡葬祭祀的痕迹。事实上我们知道，人牲曾长期在宗教仪式中扮演重要角色，例如，在朝廷举行的新年仪式上，就用四个牺牲者分别对应四个主要城门的方位。在安阳陵墓中发现的那些用于占卜的骨头与龟甲上，刻有一直流传至今的最早的汉字。这些汉字表明，书写符号与图画符号的差别并不大。埃及人的象形文字，巴比伦人的楔形文字，以及汉字，全都是从类似的图画中发展而来的。然而安阳发现的这些汉字已经充分格式化了，这迫使我们去认识自真正的“原始”图画以来汉字所经历的一个初步精细化的漫长时期，其原型迄今尚未得到揭示。

在安阳的发掘中，最具代表性的发现是那些令人惊叹的青铜器，考古学家们大吃一惊，此时，他们不得不承认，在这样一个遥远的时期，各类青铜器的仪式形态和装饰就已经被完美地确立了^[14]。假如此前我们并不知道在中国传说里安阳只不过是商朝最后的都城之一的話，那么我们恐怕会认为，这的确不亚于一项突然出现的奇迹，就像那位全副武装的雅典娜从宙斯的头颅里蹦出来一样^[15]。较早的几座都城从未得到过发掘，这些都城无疑

跟中国人青铜作品最早的那些简陋成就是同时代的。如果我们承认青铜加工技艺是在(或接近)公元前17世纪末叶从西伯利亚传入中国的话,那么,在我们能够到达中国青铜器的起点之前,还留下了一段大约300年的时期有待探究。

因此,近年在安阳发现的商代青铜器,就这样向我们展示了一座艺术的巅峰,没有必不可少的蹒跚学步阶段。在以后的几个时期里,中国的青铜器制作者从未在礼器上达到过同样的建筑构架能力,也没有实现过类似的总体平衡。最著名的例子,是那些有盖的大烹罐(被称做孟或鬯),但类似的有说服力的例子显示在那些更朴素的形态中,比如三脚罐和三脚杯(前者被称做鬲或鼎,后者被称为爵)。事实上,这种节制绝不会损害形态的典雅,正如你在一种名叫“觚”的钟形大酒杯中可以看到的那样,这种酒杯纤细得令人吃惊。装饰着大多数青铜礼器上都有的几何与神话主题的图案,也同样华丽。这些怪兽面具,尤其是饕餮,其气魄会让你大吃一惊,它们开始是牛、羊、虎、熊等写实风格的头颅,然后逐渐被程式化,成了吓人的鬼怪。在商代青铜器中(还有玉器上)发现的另一个神话形象就是夔龙,“一种声如雷霆的牛龙”。中国传说中的英雄们就是擂响用这种怪物的皮所制成的鼓,“发出雷霆般的命令”。乔治·萨勒说:“神话动物赋予它所装饰的对象以一种神秘而强大的力量。”

在安阳遗址中还发现了一些饱满有力的大理石圆雕,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雕刻过的大理石块,表现的就是神话中的怪物。(这种“对圆雕的偏爱”,在商代之后似乎停止了,直到很久之后的战国时期,中间再也没有出现过。)

最后,除了青铜器之外,安阳文化还产生了一些不同寻常的玉器,也都具有礼仪的意义。玉是纯洁的象征,根据中国古人的信仰,它拥有一种内在的“美德”。我们从中国古典文献中得知,对王族头饰来说,用玉器做装饰是允许的,而王权的显著象征,

就包括一块大玉版(圭)，牢牢系在君主的腰带上。商代遗址的发掘，出土了玉制的刀、斧、戈，其中有一些是褐色或黑色，在外表上模仿青铜的颜色，还有两种非常典型的玉制礼器：璧和琮。璧是一种中心有孔的圆片形玉器，代表天；琮是一件外方内圆的立体状玉器，代表地。这两种玉器形态，就像青铜器一样，可能也用在国王为祈求土地丰饶而献给上天的季度献祭中。

这种物质文明的丰富，证实中国古代史书在谈及商代帝王时所讲述的那些事情。商代最后一位国王——纣王，身后留下了“中国的尼禄^[16]”这样的名声，是一个精致、奢华、腐败的宫廷的产物，也是一个已经开始衰落的文明的样本。他“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畋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17]然而，在这奢华堕落的外表的后面，华夏种族的扩张依然在继续。